

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研究

图门吉日嘎拉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国土资源局, 内蒙古 东胜市 017300)

摘要: 论文考究了京根把阿秃儿之由来, 否定了京根把阿秃儿为木合黎的观点, 判断京根敖包是忽必烈合罕三子真金太子之灵魂所在地, 并研究了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祭祀及其祭祀者们。

关键词: 京根把阿秃儿; 敖包神祇; 木合黎; 真金太子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清朝顺治六年(1649), 满清政府实施了分封制, 将北元时期的鄂尔多斯万户分封为六旗时, 在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之东南, 长城以北, 离榆林(特莫额图)西北大约五十华里处的伊和其其日嘎纳(大纪汉)之西梁有一处蒙古人很早以前祭祀过来的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这个敖包神祇所在地, 因清末开荒, 旗府王公们将长城以北的地盘屡次向陕西农民租放而随着蒙古人北移, 京根神祇从原处向北移往乌日图柴达斡之下侧, 古日古木之田沟, 浩来音柴达斡、伊和尔木敦柴达斡、希布音塔拉、厚勒充音柴达斡等地至止今乌审旗嘎鲁图镇以东二十华里处的乌兰陶勒盖镇巴音敖包嘎查巴音厚德牧业社格得希音塔拉之北侧被祭祀着。在这迁移的整个过程中, 蒙古人仅仅带去了可取的纛之神祇, 而留下了不可带去的敖包神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停奉的京根神祇的祭祀事宜, 从七十年代末起有恢复祭祀的趋向后, 该神祇的珠玛(祭祀主持)扎·朋苏格脑日布, 扎·格日勒朝格图兄弟二人于 1980 年制作了《成吉思汗京根把阿秃儿陵墓》的木牌, 挂在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祭祀庙门檐之上。1984 年, 京根神祇的珠玛和施主们提出从六十年代初安放在成吉思汗陵的纛之神祇请回原处祭祀的建议, 并按照三次派出珠玛代表进行商议的结果, 于 1986 年秋将纛之神祇从成吉思汗陵请回今日的祭祀区, 当年就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近些年, 笔者趁京根神祇之祭祀机会曾到过祭祀区, 当临近祭祀区时, 便能看到挂着《木华黎祭祀区》的牌子, 靠近跟前就看到称《京根把阿秃儿木华黎神矛祭》的牌子, 当时感到很好奇, 是什么人将京根神祇为木合黎神祇的, 他的依据何在, 为此我尽一切可能去查阅地方史志文化资料和历史文献及专著, 进行追寻和鉴别。现在对此提出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和看法, 请诸位学者尊师予以指正。

一、京根神祇之研究概况

京根神祇历经六次北移, 到了现在的祭祀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由社会因素停奉的纛之神祇也转移并安放在成吉思汗陵。可是, 到七十年代末恢复了停奉的祭祀活动。尤其是自 1984 年起, 该神祇的珠玛和施主们忙于从成吉思汗陵把纛之神祇请回现在的祭祀区时, 文人查干宝恩敦、察·哈斯毕力格图等人, 就打算探讨和弄清这个京根把阿秃儿之敖包神祇的由来。并于当年开始, 到实地考察或问卷华言, 并以专题形式撰写考察记事。自 1984 年到 1992 年间, 发表于《鄂尔多斯文化遗产》、《乌审文史》等专刊。对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进行了说明和阐述。

(一) 珠玛阿拉坦布鲁和台吉赛音脑日布之言

阿拉坦布鲁是京根神祇的老一代珠玛。我称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人, 讲授京根神祇为木合黎墓地的第一人, 并称之为唯一人是不过分的。因为, 于 1984 年查干宝恩敦、察·哈斯毕力格图等, 于 1999 年 10 月包·达瓦扎木苏、扎·格日勒朝格图等都曾采访过他, 并为自己所写的内容提供了依

据。现将阿拉坦布鲁之说誊录如下：我在十一岁那年，我的老师斯当热希给乌日图那森说得话，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咱们的祖先不中断地祭奉过来的京根敖包究竟是什么人的墓地？为什么将它隐匿起来呢？是这样的，这确实把成吉思汗的特日贡把阿秃儿（首位英雄）木合黎给安葬得敖包。我们这儿的人把“特日贡”一词也说成“京根”一词。什么原因把京根把阿秃儿敖包为济农木合黎墓地，很早以前就这个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大珠玛给下任的大珠玛们交待这个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确实是安葬济农木合黎真正遗体的敖包。且有着口头解释交待并提醒严格保密的规定。那么，为何把京根把阿秃儿的墓地说成济农木合黎的墓地呢？这里有什么历史依据呢？我祖父（呼日嘎岱）给我父亲（那森巴亚尔）这样说得时候，我站在旁边听到的。在这个京根敖包的祭祀庙里，珍藏着忽必烈合罕下旨使畏兀儿津部族的蒙古人世代秘密保护木合黎把阿秃儿神矛之金书宝盒。当时任京根敖包会长的叫张海清的农民也曾说，在京根敖包祭祀庙里确实有一书盒，可惜，那个宝盒在文革中被毁。^[1]以上，阿拉坦布鲁所说的忽必烈合罕向京根神祇赐金书宝盒，下旨畏兀儿津部族秘密保护木合黎墓地之说很奇特。因为，京根把阿秃儿不是木合黎而是别人，并且这个京根把阿秃儿和忽必烈合罕有某种特殊关系，而且生活在同一时代，那么可以致信忽必烈合罕赐宝盒之说。可是，忽必烈合罕下旨使畏兀儿津部族秘密保护木合黎墓地之说，的确难以致信。因为木合黎去世于1223年是有依据的，托雷之子忽必烈于1215年生，木合黎去世之年，他刚刚九岁的孩子。尤其，忽必烈称帝是1260年，离木合黎去世晚37年。因此，我认为忽必烈赐宝盒之事算是真事，也肯定不是赐给木合黎的。

赛音脑日布是台吉出身的人（指黄金家族之人）。包·达瓦扎木苏等就京根神祇之事采访了这位老人。并以他所讲述的内容为依据。现誊其讲述的内容如下：“我在年青的时候，好几次去参加查干苏鲁格祭祀。查干苏鲁格马湮裸祭礼开始的时候，首先往西南方向献马湮并呼唤‘敬圣主京根把阿秃儿’。原先成吉思汗陵的达尔哈特人来到我们畏兀儿津哈然家时，不向我们畏兀儿津哈然家化缘。我们畏兀儿津哈然蒙古人也不向伊金成吉思四时大宴缴纳供品。听老人们说，于鄂尔多斯历法6月21日，成吉思汗查干苏鲁格马湮祭礼时，全体蒙古人跑步献马奶，允许畏兀儿津蒙古人可以站着献马奶，这也是忽必烈合罕恩赐的。”^[2]对此，赛音脑日布讲了三件很有趣的事：第一，行查干苏鲁格马湮祭礼时首先往西南方向献着马奶呼唤“敬圣主京根把阿秃儿”，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就说明这个京根把阿秃儿一定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诸先祖之一。《嘎尔利祭》中记载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诸先祖神灵举行焚食祭祀的时候，祝颂使臣拿着《嘎尔利金册》诵道：“呈成吉思汗孛儿帖珠信哈屯……，真金呼赫钦，呼格岱与内臣挚友，完者都妥欢帖睦尔和哈屯诸子。”^[3]这里呼唤的显然都是黄金家族先皇祖上和皇后诸子的名号。但是，这里首先呼唤的是成吉思汗孛儿帖兀真，而没有呼唤“敬圣主京根把阿秃儿”。第二，说是畏兀儿津哈然家不向成吉思汗四时大宴缴纳供品，达尔哈特人也不向我们化缘，这里，畏兀儿津哈然人享有这样的特权，畏兀儿津哈然人不是立过什么功劳不缴纳供品，而是说明畏兀儿津人祭祀的京根把阿秃儿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具有非常高地位的大人物。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畏兀儿津人因供奉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而不再向成吉思汗四时大宴复供。第三，6月21日成吉思汗普天供奉的大祭祀中举行查干苏鲁格马湮裸祭礼时，全体蒙古人跑步裸祭，而畏兀儿津哈然人可以站着裸祭的特权是由忽必烈合罕恩赐。此话是否符合历史真相，从21日的祭祀过程看，21日的马湮裸祭礼是对上苍九十九天举行祭祀的主要活动。“诵马祭《金久》祝颂者来到现场，合罕或济农，由一人……进行裸祭奔跑时，祝颂者诵《白骡马裸祝词》……合罕行裸祭礼三回后，诸台吉诺颜进行裸祭合罕或济农揭开马湮裸祭礼序幕进行裸祭礼后，便到金殿内启引大祭礼，诸汗和台吉们在其他斡耳朵开始举行祭祀。这时在夏营地所有白宫祭祀也普遍开始举行。”^[4]这里很清楚地记载了它的过程。由此看来，包括畏兀儿津人在内的其他朝圣者别说行裸祭礼，有可能连跟前都难以靠近。因为这个祭祀的整个过程是按非常详细而严格的程序来进行的宫殿祭祀。

（二）查干宝恩敦、察·哈斯毕力格图的研究

查干宝恩敦和察·哈斯毕力格图一同于1984年第一次到陕西省榆林县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在对京根神祇进行考察，并采访阿拉坦布鲁等人的基础上，写了《京根敖包神祇的记事》一文，在当年10月发表。誊其考察主要内容如下：据时时代祭祀这个神祇的布鲁同志说（指阿拉坦布鲁），当他十来岁的时候，听他老师斯当热希和乌日图那森俩聊天时说，京根神祇是木合黎巴阿秃儿的墓地。

但那时候因秘而不宣，往外绝不允许说是木合黎的墓地，心里知道就行。所以，只许说京根把阿秃儿的道理就是这样。布鲁同志听到这番话后，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些说法虽然都像古代传说似的，但是都认为是无稽之谈的话，可能会产生失误，从京根神祇曾经是秘密神祇的这些看法与现在这里人的那些说法也许恰好相适应。所以，这个秘密二字对我来讲确实像一道解不开的谜语。按我本人的想象，当时说是成吉思合罕把阿秃儿也许是伊森兀尔鲁格（九杰）之一。如果在伊森兀尔鲁格中说是京根把阿秃儿，看来毫无疑问就是木合黎或孛斡儿出二人了。从济农木合黎当时在亲自指挥南方战役时去世的这一说法来讲，这里会真的是木合黎陵墓吗？这个称秘密的谜形成了哑谜，使我焦虑。我虽然读了一些古书，但没有系统地去学习和研究。这个难以解开的谜，最终还是从常读的《青史演义》里去找，找来找去这个《青史演义》仿佛给我解开了谜底。《青史演义》中说：“癸未三月初三寅时国王木合黎 54 岁时去世于蓟州闻喜县”，木合黎临终前还嘱咐说：“现在要好好保护我的遗骨暗葬于我所战得的南方边陲……何时南宋灭亡，金朝消失再将我的遗骨移葬北方”。木合黎去世后，其子孛罗一下子成殓十俱，墓于平地。好像给我们指点了他去世的年月地点，连秘密都给讲清楚了。正当此时，因我从贡布仁钦先生日译蒙《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一书中提道的“木合黎于 1223 年 4 月在山西发动新的攻势时牺牲”的消息与《青史演义》基本相近。以我本人的愚见，我虽然弄不清当时的闻喜县现在究竟在何处，但是木合黎去世的地方无论如何也在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所以，木合黎所说的：“我所战得的南方边陲”也许在这个地区的边界长城。如果当时确实把一俱遗体假殓多俱安葬的话，完全有可能这个京根敖包就是其中之一了。因为我本人这样粗猜，所以不得随便罗嗦与此有关联的一些说法。若是这样岂能因闲话多而耽误读者哲人们的宝贵时间，劳驾玉体安康。[5]以上是查干宝恩敦用阿拉坦布鲁小时候旁听斯当热希、乌日图那森二人的谈话以及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的故事情节为依据，提出京根神祇是木合黎神祇的判断，并作出了论证。所以，可将查干宝恩敦可以视为对京根神祇进行研究，并写出文字记事，将京根把阿秃儿为国王木合黎的第一人。

察·哈斯毕力格图不仅参加了 1984 的考察，还相继于 1987 年 5 月、1988 年 11 月、1990 年 6 月连续进行了三次采访，几乎每次都利用鄂尔多斯历法八月或十一月（呼必萨热）祭祀时间，详细记录该敖包神祇举行祭祀的过程和内容。查阅该神祇的祭祀经卷和木合黎及其子孙后代进行追述。于 1992 年 11 月，在《乌审文史》第 16 期上，除转载查干宝恩敦留下的记事外，用全刊发表了他本人所撰写和汇集的《关于成吉思汗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考察报告》、《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考察材料——关于兀尔鲁格木合黎传及其后裔》、调查《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的祭祀者——畏兀尔津哈然的初步体会》以及附件五则：1.《清朝时期的公文一份》、《民国时期公文一份》、《独贵龙运动期间公文一份》；2.《京根敖包祭祀经卷吉祥威严焕发一书》；3.《曲鲁克孛斡儿出世袭家谱一卷》；4.《畏兀尔津哈然五个苏木家户名单》；5.《成吉思合罕威权莫大的哈日苏勒德》。下面将察·哈斯毕力格图对京根神祇的考察主要内容誊写如下：“京根敖包神祇”这三个词，是我要说明的重点，所以，先概括其奥秘在于“京根”中，证据在于“敖包”上，依据在于“神祇”里。首先记载我本人当前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说是奥秘在“京根”中，我们蒙古人自古以来为了隐瞒君主和祖先的真名墓地，对形形色色的敌视者致死不说，相互告诫的习惯，并把祖人的墓地让别人刨开视为作孽，便誓死保护它。所以，历来把某一位巨人名将的真名，以某种方式保密于别人。同时，也起个永不可忘却的代称来记下他，因为正是这样，将成吉思合罕九杰大将（伊森兀尔鲁格）之首位将军木合黎的陵墓为“京根把阿秃儿陵墓”，起了个纪念神秘意义之公开的名字。在鄂尔多斯将“京根”，“头等”、“一等”、“巨匠”的代称很多。如“印章五京根”、“京根毕帖式”、“京根名次的摔跤手”、“京根达尔哈特”等。这些是它的证据。第二，证据在于敖包上。众蒙古人从古到今处处树建敖包，并不只是为了举行盛大的祭祀，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象征某种历史意义的事情，立永久性的纪念碑或吉祥物，年年按规定时间完成祭祀事宜。虽说这个设宴算是古代萨满教的一种大信奉，但它也是蒙古人的重大祭祀民俗。如，要是承认鄂尔多斯地区的阿拉坦甘德尔敖包是成吉思合罕陵的一座纪念碑的话，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将乌审旗京根把阿秃儿敖包论证为兀尔鲁格木合黎或曲鲁克孛斡儿出的陵墓或纪念碑的一个证据来看待。第三，说是依据在于神祇里，首先需要作一些说明。成吉思合罕京根把阿秃儿纛徽从古到今一直祭祀过来的长十三尺柳木细椽杆端插入以乌金制成的三叉戟。用黑枣骝公

马连年未剪的鬃毛作“呼虎勒”的圆木盘固定在其下沿的纛徽叫京根神祇”。将此又称兀尔鲁格木合黎大军的威权莫大的哈日苏勒德高举在阵前，木合黎军队就所向无敌，惧不可犯。据说：兀尔鲁格木合黎去世后，由曲鲁克孛斡儿出的提议是将其交给其属部族的一支四鄂托克畏兀尔津的队伍来祭祀的。[6]从察·哈斯毕力格图的上述研究看，我视他为将京根称木合黎的观点，更加深化和定型的人是不过分的。但酌量他所说的内容，他没有说明“京根”必定是“木合黎”的必然性是什么。换言之，没有说明为什么给木合黎起永久保密于世人并且还永远不可忘却的代称的必要性。这个必然性和必要性只能从木合黎去世时候的历史处境所确定。所以我认为，这是分析和确定问题的一项重要环节。再说，关于“伊森兀尔鲁格及其特日贡”的说法，恰好与木合黎同一时代著就的《蒙古秘史》中将成吉思合罕功臣们记载为“四杰”、“四犬”。从未见到“伊森兀尔鲁格”之记载。而较晚编著的《十善福白史册》、《蒙古源流》等史书中有“伊森兀尔鲁格”的记载。但是，木合黎去世时连“伊森兀尔鲁格”的说法都没有，岂有木合黎列为“伊森兀尔鲁格之特日贡”，起个“京根”的代称保密的可能。除此之外，果真将其列为《伊森兀尔鲁格》起个代称来保密的话，不是孛斡儿出“京根”，木合黎“第二位”吗？这些都是使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关于国王木合黎及京根巴阿秃儿的追述

(一)关于国王木合黎

木合黎（1169—1223）是扎剌亦儿氏帖列格秃伯颜之子古温豁阿之三子。“成吉思·合罕又对忽必来说：……如把忽必来、者勒蔑、者别、速别额台这四犬派往所指的地方，让孛斡儿出、木合黎、孛勒忽勒、赤刺温·巴阿秃儿这四杰在我自己的身边，在厮杀的日子，让以主儿扯歹、忽亦勒答儿为首的兀鲁兀惕，忙忽惕部人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心就完全可以泰然无虑。”[7]成吉思合罕在这里指出，木合黎是他十位功臣之一。成吉思·合罕又对木合黎降旨，为了让木合黎子子孙孙都做全百姓的国王，封给国王的称号。木合黎国王掌管左翼，做依合刺温一只敦山的万户。”[8]给木合黎封大蒙古帝国左翼万户长。“巴儿思亦勒即虎年(1218)成吉思汗封木合黎为「国王」。封他为「国王」的原因是：以前成吉思汗曾将他派到女真地区边境上去，女真诸部称他为「国王」，意即「一国之主」。”[成吉思合罕]再次派他到那边去时，说到“这个称号是个幸福的征兆，便封给了他。”[9]“丁丑八月(1217)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券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且论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游大旗，仍论诸将曰：「木合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10]从上述圣旨、诏书、恩赐可以看出，木合黎的地位、品级有多么高厚。

这里略提成吉思合罕赐木合黎大合罕亲所树起的九游白纛的说法。《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称：“虎儿年〔丙寅，1206年〕，在斡难河源头，召集大会，竖起九游白纛共奉成吉思·合罕以合罕之尊号。”[11]《史集》称：“虎年(1206年)……初春，成吉思汗下令建九脚白旄纛、隆重地召集举行大忽里勒台，在这次忽里勒台上他获得了「成吉思汗」的尊号。”[12]《圣武亲征录》称：“丙寅，大会诸王百官于斡难河之源，建九游白旗。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13]《蒙古源流》称：“随后立即在斡难河源头树起了九游白纛，派〔人〕到跌里温·盘陀之地树起了四旂黑灵旄，〔铁木真〕作了四十万巴塔人众之主。”[14]《元史》称：“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15]《元史·木华黎列传》称“丁丑八月，赐大驾所建九游大旗”等记载。[15]所以，给木合黎赐九脚白旄纛的说法有必要找依据。因为在《蒙古秘史》、《史集》、《蒙古源流》这三部蒙古史顶尖文献中，不说是给木合黎赐白纛。连纛字儿都没提到过，在《元史·木华黎列传》中虽有赐旗的记载，但不是白旗，而是大旗，并对其颜色只字未提，正因为这样，将给木合黎赐旗的事，视为真凭实据的实事，也有区别于大蒙古国威严象征的大合罕亲所树起的白旄纛。成吉思合罕赐木合黎大合罕亲所树起的九游白纛的说法与历史真相不符。此事因与我所论证的题目有些距离，这里不一一细说。

成吉思合罕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帝国后，矛头直指结成深仇大恨的金国。在1211年、1214年两次进攻金国。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回到克鲁伦河。但是木合黎继完成清除辽河流域

的女真军队的任务后，1217年回到蒙古，并于同年返回金国境内的中都(此时改名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军事指挥机构。控制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组成的十万大军。虽然企图从金朝手中夺回山西、河北、山东，但遇到了金国强烈的抵抗。1218年，与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山西。10月攻陷山西西部的太原。到1219年底，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夏秋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此后，推进到山东西部，于10月占领了山东重要城市济南。当年在山东东部的由汉人组成的“红袄军”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斗争，引起木合黎的注意。1220年底，从济南移师南渡黄河，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黄陵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扩大了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的大部领土。那时候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里。山西仍在金朝的统治下。在1221年中期，木合黎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一次巨大攻势。此次，木合黎首次越过鄂尔多斯时，西夏军队害怕木合黎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默许并提供了五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合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年初攻陷了陕西西北部和甘肃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木合黎留下蒙古不花指挥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一次新的反攻。同时，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军队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于1222年秋季，木合黎军队进入山西，仍然不能迫使长安和凤翔等重要城市投降。在此紧要关头，西夏军队又突然撤回，使蒙古军队的军事力量削弱。木合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回到了山西。不久就病倒并去世。这大约在当年的3月或4月的事了。关于木合黎去世的时间、地点，从《木合黎的对金战役》插图21[16]看，木合黎于1223年3月解除对凤翔的包围后东进，离黄河与渭水合流向东弯曲之处不远的地方，架浮桥渡河进入山西，并与河东不太远的河中府的地盘亡故。这与“木合黎于1223年4月在山西发动新的攻势时牺牲”[17]的记载相吻合。“癸未春，师还，浮梁未成，顾诸将曰：「桥未毕工，安可坐待乎！」复攻下河西堡寨十余。三月，渡河还闻喜县，疾笃，召其弟带孙曰：「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18]所以，虽在《蒙古秘史》、《史集》、《蒙古源流》等文献中对木合黎的去世没有记载。但在《元史》、《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和《剑桥中国史》均有记载，并无多少差异。对木合黎的去世时间，史书中论证的1223年3月或4月这个说法是无争议的事了。而且，其去世的地方是山西闻喜县(今山西省郛城市北闻喜县)。这与考地图示意标记证实的离黄河渭水合流东曲处北不远的判断基本一致。这样，木合黎去世的地方，当时在蒙古人控制下的金朝地盘，而不是西夏的地盘。并且西夏国被蒙古人征服的时间，比木合黎去世的时间整整晚四年。除此之外，从《西夏的发展》插图10[19]看，当时的河套地区南部，从东往西列：银州、龙州、黄州、会州等城寨都是西夏国南部边城。这里的银州城是今陕西省榆林市。在此城西北的伊和其其日嘎纳这个地方，毫无疑问是当时的西夏地盘了。所以考究带孙诺颜把木合黎遗骨葬于何处的可能性上，按我本人的推测：一种可能是也许葬于当地一处适当的地方；另一种可能是葬于木合黎去世时候的大蒙古国境内的任何一处地方。但我认为，没有可能将木合黎的遗骨，从那么遥远的闻喜运送到当时属西夏地盘——当今的伊和其其日嘎纳安葬的。另外，木合黎是刚对违盟的西夏边界进行报复性进攻后，回到山西时去世的。他不但没有可能留下将自己的遗骨移葬于西夏辖地的遗嘱；而其弟带孙也不可能将兄之遗骨移葬到这个恨之入骨的异国他乡。关于木合黎就讲述得这么多。再看京根把阿秃儿。

(二)关于京根把阿秃儿

《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称：“皇太子金格玛……其注一记：金格曼……这里称：金格旤是写错的字。”[20]也在该书中称：“裕宗京格玛，其注一记：京格玛是青格旤。”[21]纳塔著《金鬃》称：“台吉金根。”[22]《马可·波罗游记》称：“名叫京根，其注十三记：京根是真金太子。”[23]《蒙古源流》研究(蒙版)称：“青格旤”[24]《金轮千辐》称：“汉文史册记皇太子金根。”[25]《恒河之流》称：“皇太子真金，其注一记：将青格旤在汉史里称真金。”[26]《忽必烈汗》称：“青根。”[27]《阿萨拉齐史》称：“阿拉坦台吉罕，其注一百陆拾肆中说：阿拉坦台吉罕名叫青格旤。”[28]在上述诸多历史文献中，“京根”这个名字有金格玛、金格曼、金格旤、金根、京根、京格玛、真金

(音译汉名)青根、青格哂、阿拉坦台吉罕等不同的记法。显而易见，都记载得是真金太子一人是很清楚的事了。“京根”这个词实际上是历史人物的真名实称，而不是表于含有“特日贡”(首位)之意思的虚名代称。“京根”这个人名为何有这么如此多的写法和读音呢？

一个人的名字不但只有一种读音，而且应该只有一种写法。可是，京根在历史文献中有金格玛、金格曼、金格哂、金根、真金、京格哂、京根、青根、青格哂、阿拉坦台吉罕等，除了阿拉坦台吉罕以外，大概有九种写法。在回鹘式(畏兀)蒙古语中“齐”和“吉”两种辅音音节为开头的两类写法和读音。我所能查阅到的史册中，在十七世纪用回鹘式蒙古语书写的《蒙古源流》中，记载为青格哂，其后用回鹘式蒙古语书写的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一些文献中均称之为青格哂。这里不必要一一引证。用他族语书写的蒙古史，首先是公元1300年至1311年止，由伊利汗国首席宰相拉施特受合赞汗(1295—1304)和完者都汗(1304—1316)之命用波斯文修撰的《史集》。这部巨著在十九世纪末，由洪钧通报。至二十世纪从欧译本转译到汉文。洪钧通报之前，在中国谁都不知道有拉施特的著作。其次，就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令宋濂等编修的《元史》。《史集》和《元史》都将青格哂记载为京根或真金。但是，宋濂等利用拉施特的史料是没有丝毫的可能。那么，用他族语写的这两部文献为何都把青格哂书写为京根或真金呢？因为这两部文献所利用的元代的史料是一样的。尤其，关于青格哂的史料都是一样的。他们所利用的史料都是八思巴方体字所记载的史料。“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合罕降旨八思巴〕……命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诏颁行于天下。”[29]“此新字称八思巴字或方体字……当时主要应用于书籍或朝政制作的碑文、牌子、元币等……以新字撰写和珍藏的……资料对研究蒙古史、蒙古语汉语之文字史研究都含有很高的价值。”[30]这里，对忽必烈合罕时期之方体字的创制时间，启用时间，应用范围及价值等予以了说明。以八思巴字刻制的III号碑铭原文：将“9，以拉丁文转写为jingisqanu。”[31]将回纥蒙文的“青格思罕兀”(汉音译)记写为“京格思罕兀”了。但是，成吉思合罕的“青格思”这个词不仅在用回纥蒙文撰写的《蒙古秘史》有记载，而且以口头传史习惯的蒙古人都记得很清楚。所以，除蒙古族以外，其他民族利用八思巴字资料，就会发生不同的读音，在八思巴字资料中，如果把“青格哂”以拉丁文转写为“jingim”。拉施特利用时记载为“京格哂”，宋濂等利用时一定记载为“真金”。为此利用《元史》等汉史资料撰写蒙古史的人们译称为“京根或京格哂”。除此之外，《蒙古秘史》中的“青格思”这个词用中文音译时称“成吉思”。如果“青格思”与“青格哂”都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话，将“青格哂”一定也音译为“成吉木”的。但是，“青格哂”恰好生活在使用八思巴方体字时代，这个“青格哂”就变为“真金”。而且也变为“京根”了。这就是产生回纥(畏兀)蒙字辅音“吉”和“齐”为开头的两个不同读音和写法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有了“京根哂、京格玛、京根、金格玛、金格曼、金格哂、金根、真金、青根”等类似不同的记载。这些指的是真金太子。那么，这个真金太子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据历史文献记载，“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讳真金，世祖嫡子也。母昭睿顺圣皇后，弘吉烈氏。少从姚枢，竦默受《孝经》，及终卷，世祖大悦，设食飧枢等。”[32]“在大汗宫殿迎面与大汗宫殿相似的另有一宫，它就是大汗太子真金居焉。盖其后嗣有继承帝位的人，其宫殿内的一切摆设都与其父汗相同也。”[33]“中统三年(1262)封燕王，守中书令……四年(1263)，兼判枢密院事……(至元)十年二月，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34]“1279年……忽必烈合罕诏书太子参与处理朝政，一切政事都须先向太子禀报，然后，奏闻合罕。”[35]“裕宗孝于宗亲，仁于民众，法则明鉴，谨重旧规，深明道义。”[36]罗密公对真金作了正确的评价。并且“噫，神圣大宇之伊金京根把阿秃儿您，昔日在已故本源喇嘛眼前，许愿守护佛祖”。[37]这个说法恰好相符与他的身份和使命。由此可见，京根是大元时期忽必烈合罕着重培养为罕位继承人的，有着相当高地位的已被册封为太子的儿子。

真金(1243—1285)不仅是忽必烈薛禅合罕悦立的太子，也是唯一继承罕位而培养的儿子。史书称：“却说斡迦罗伐剌底·薛禅皇帝美丽的察必皇后生了朵儿只、忙哥刺、真金、那木罕四个儿子。[38]“指定真金为皇位继承人。”[39]“薛禅合罕长子(其实三子)阿拉坦罕在即位前去世。”[40]“却说，[忽必烈]以「我已经降旨过圣旨」[为信]、在审视了真金太子的三个儿子甘麻刺，答刺麻·八刺和完泽

笃三人之后，[降旨]说：「这个完泽笃能执掌政权」。于是[忽必烈皇帝]在自己还健在，但已寿达八十岁的时候，于甲午年使[真金]第三子完泽笃即了皇位。”[41]除此之外，在《大黄册》、《元史》、蒙古版《古今蒙古源流》、《金鬘》中都有真金太子即位前去世，其三子完泽笃即位的记载。这里不作一一引证。这里真金太子是否即位，我所查到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提供可靠的依据。薛禅合罕虽将真金立为太子，可他在大罕健在的时候去世，未能即位而已。

从京根把阿秃儿这个名词的使用范性看真金。在历史文献中称“孛端察儿·蒙合黑首领之儿子合必赤·把阿秃儿的合必赤是其名也，把阿秃儿是合必赤的尊称或光荣的称号也。合必赤是成吉思合罕祖先中第一个受把阿秃儿称号的人。”[42]由此可知，蒙古人在古代只有给宗主或部族首领才授予把阿秃儿这个称号。知其实情，需要从孛端察儿首领时开始考究。“在朵奔·蔑儿干死后，阿阑·豁阿没有了丈夫，却[又]生了三个儿子。”[43]“不忽·合塔吉成了合塔斤氏[的始祖]，不忽秃·撒勒只成了撒勒只兀惕氏[的始祖]，孛端察儿成了孛儿只斤氏[的始祖]。”[44]合塔斤、撒勒只兀惕、孛儿只斤三个氏称乞牙惕部族或称乞牙惕部落，是后来的蒙古部落。由此看来，乞颜部或蒙古部始于孛端察儿，推举孛端察儿为孛儿只斤氏宗主并世袭相沿。这就表明蒙古社会开始形成封建体系。自孛端察儿首领诞辰的970年到也速该·把阿秃儿去世的1170年止，整整二百年来，蒙古人一直沿袭“曲鲁克”、“把阿秃儿”、“罕”等称号或封号的规矩。对此细考的话：“孛端察儿首领……死后，幼子合必赤·曲鲁克(蒙古秘史称把阿秃儿)即位。曲鲁克首领死后，其子别克儿·把阿秃儿即位。巴阿秃儿首领死后，儿子蔑年·土敦即位。……土敦首领死后，长子合赤·曲鲁克即位。其后，幼弟纳臣·把阿秃儿即位。纳臣把哥合赤·曲鲁克儿子海都为过继子。纳臣首领死后，海都那颜即位。……其后，儿子伯升豁儿即位。升豁儿首领死后，其子屯必乃·薛禅即位……薛禅首领死后，其幼子合不勒合罕即位。”[45]“本着合不勒·合罕遗旨……却让想昆·必利格的儿子俺巴孩·合罕，统辖了众忙忽勒(蒙古)。”[46]“俺巴孩·合罕……奉举忽图刺为合罕。”[47]其后，“忽图刺的哥把儿坛把阿秃儿(合不勒次子)即位，把儿坛首领死后，三子也速该·巴阿秃儿即位。”[48]从孛端察儿到也速该十四位首领或君主中，合必赤·把阿秃儿、别克儿·把阿秃儿、合赤·曲鲁克、纳臣·把阿秃儿、合不勒·合罕、俺巴孩·合罕、忽图刺·合罕、把儿坦·把阿秃儿、也速该·把阿秃儿三位合罕、五位把阿秃儿，一位曲鲁克。除此之外，“寻·薛出列的儿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儿(合不勒合罕侄儿)”[49]“[合不勒·汗的]儿子为合丹把阿秃儿。”[50]“[合不勒合罕]儿子忽兰·把阿秃儿”，[51]还有三位“把阿秃儿”共八位把阿秃儿。在当时将获得“把阿秃儿”称号的就可视为有资格被奉举罕位的人。忽必烈合罕册封为太子的真金有资格当皇帝。因此，称他为“京根·把阿秃儿”是表明当时的规矩，到十三世纪末，还存有痕迹。所以，“京根·把阿秃儿”的称呼流传至今。木合黎是成吉思合罕的“曲鲁克”，没有可能称之为“把阿秃儿”。因为，成吉思合罕与木合黎是君臣关系。成吉思合罕把“四犬”、“四杰”中，哪一个都没有封号为“把阿秃儿”。只是以后，“把阿秃儿”这个称号原使用范性不明显的时候，才称呼为“把阿秃儿”而已。如木合黎·把阿秃儿、哲别·把阿秃儿、速别额台·把阿秃儿等。除此之外，北元时期在黄金家族里，虽有“把阿秃儿”称呼的人较多，但是，它与上述情况是否一样，没有仔细考究。如，合罕中有“林丹·把都儿”。[52]非合罕的人中有“朝儿克·青·把都儿、完者·允都赤·打儿汉·把都儿”。[53]所以，“京根·把阿秃儿”这个称号符合与11—13世纪，授予“把阿秃儿”称号的规矩。从那时期到现在仍称呼为“京根·把阿秃儿”，从侧面表明“京根·把阿秃儿”是一位有资格当皇帝的、地位极高的人。

三、真金太子故去之地

关于真金之生卒时间，《元史·裕宗传》没有明确的记载。“经后人的研究，裕宗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丁未薨，寿四十有三。”[54]这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55]的记载相符合。“从有些史书中载国师八思巴喇嘛往西域萨思迦寺返回时，皇帝、皇后二人降旨说：‘我们所生的儿子当中，谁愿送喇嘛并信奉于他，驻在那里祭祀的话，就让他儿子即位。’真金说：‘我送往前去实现父母的圣旨(恩德)’。便送去国师活佛喇嘛。”[25]《水晶鉴》载：“真金太子送往八思巴喇嘛去西域时过世。”[56]“却说，先前在薛禅皇帝六十六岁，八思巴喇嘛四十六岁的庚辰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准备起程返回(吐蕃)的时候，皇帝曾降旨说过：‘我的四个儿

子当中，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个肯去（护）送这位大宝神圣喇嘛，将来就让他继承我的罕位’。两个哥哥说：‘我们不去’。三「弟」真金太子说：‘我要报答父亲的恩德，我去吧’。他护送八思巴喇嘛前往吐蕃，就在〔那〕不坏法域去世了。”[57]《喀尔喀简史》载：“真金太子在处理朝廷和宗教事务时，去世于合申(唐兀惕)地区。”[58]由此可见，真金太子去世于1285年，去世于西域的方向。

我们不仅需要考究真金太子自1280年送八思巴喇嘛到1285年去世为止的五年期间，真金太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还需要考究他在唐兀惕地区过世的具体地点。关于其去世的具体地点，有两种可能并存。其一，从大都或上都送往萨迦寺途中在唐兀惕地区；其二，往回返的途中在唐兀惕地区。其中，后一种可能比前一种可能更大。因为，在赶往途中花费五年时间的可能甚小。所以，不仅他已经赶到萨迦寺，而且还驻在那里履行其施主使命，并一定要完成祭奉任务。实现这个事宜的时间，就在这个五年之内。有“让他的儿子即位”和“让其永远继我罕位”等记载，忽必烈薛禅在末期，没有让真金太子即位，而且承诺给真金太子的儿子即位了。由此，也可以将真金太子视为在萨迦寺放放心心地驻下来，完成祭奉使命。但是在《大蒙古宗教史胜宝明灯》卷一载“八思巴喇嘛提出过……太子真金……即位事业，佛不保佑等说法，仔细酌量的话，它解开了蒙古史书称完泽笃(成宗)即位之真正的「秘密」。”[59]“却说，〔忽必烈〕以我已经降旨过圣旨”为信……使真金太子第三子完泽笃即了皇帝位。[41]这符合“忽必烈多次后悔，因偏信一时的谗言阿谀，将加快自己的爱子之末日”[60]的记载。那真金太子究竟由什么原因从萨迦寺往回返的？在返程途中怎么得病并加重及在路途中过世的？

“十八年，弘吉刺皇后崩(太子)自猎所奔赴，勺饮不入口者终日，设庐帐居之。”[61]弘吉刺皇后是指忽必烈薛禅合罕皇后真金之生母察必皇后。她于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乙未崩。真金太子于1280年到达萨迦寺。由于地处遥远，得到消息得花费一定的时间。“自猎所”应该是指当时他所在的萨迦寺附近。由于真金太子是非常孝顺于父母的儿子，所以，他接到母后崩之噩耗，立即返回大都或上都，而且回途中废寝忘食、荒野宿营、快马疾跑等因素，有可能复发其痼疾，加之路途遥远、险阻重重，兼受忧愁和疲劳，使其病情加剧、恶化。或许在途中，到历史上的唐兀惕地区——当今的伊和其日嘎纳的地方故去。关于这方面，当时已具备了两个条件。其一，忽必烈薛禅的察必皇后生的二子忙哥刺及其儿子阿难答的安西王之官邸——察罕八刺哈孙在此。其二，通往南北的驿站枢纽——察罕脑儿总站在此。

(一) 忙哥刺官邸——察罕八刺哈孙

1251年，蒙哥合罕给其弟忽必烈封陕西省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当年将忽必烈任东方地区大都统，统辖了漠南地区和汉族地区。忽必烈称帝后，将这个地区分封诸子，河套地区的一部分成为其子忙哥刺的封地。忙哥刺属下的四千户游牧于鄂尔多斯地区。对此，据《元史》所载，忙哥刺于至元九年(1272)受封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十一年(1274)益封为秦王，至元十七年(1280)死。其后，由其子阿难答袭封。“铁穆耳合罕……把(原来)忽必烈合罕给予忙哥刺的那支(十五万)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62]“〔至元〕十七年(1280)……五月……甲辰，作了行宫于察罕脑儿。”[63]关于察罕八刺哈孙，“该处有以下一些大城为其君主之京城。京兆府、甘州府、额里海牙(1rqai)今银川，阿剌筛(HalaJan)，阿黑—八里(Aq-Baliq)[白城]”。[64]德·蒙学家伯希和解译《史集》中的阿黑——八里(Aq-Baliq)乃突厥语词，汉语意为白城，蒙古语称察罕八刺哈孙(Ca y anBal y aSun)。察罕八刺哈孙即察罕脑儿城，且由于安西王行宫所在，故《史集》将它列入阿难答所辖唐兀境五大都邑之一了。对此，读“伯希和著《马可波罗注译》(第1卷1959年出版)第143条「察罕脑儿」……在黄河河套内鄂尔多斯境，榆林以西和横山县北……最先……考定的……人是伯希和。”[65]此外，张雨《边政考》载：“又罕脑儿城在骆驼山西”，而“忻都城，在又罕脑儿城西。”[66]由此可见，察罕脑儿城——察罕八刺哈孙是忙哥刺及其儿子阿难答时期，已成为元代在鄂尔多斯的行政、军事、经济中心。

伯希和做出的察罕脑儿在榆林以西和横山县北的结论恰恰符合与今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乡的白城滩村境内有察罕八刺哈孙旧墟的实际情况(当地蒙古人至今仍称察罕八刺哈孙——作者)。最近，用

卫星定位仪进行测量而得知，察罕八剌哈孙旧墟按地图方位，正好在榆林正西 80 华里，横山县正北 60 华里(均为直线距离——作者)。它就是忙哥刺及其儿子阿难答宫殿所在地点。可是，察罕脑儿这个名称究竟从哪个察罕脑儿得来的，还在争论之中。有人称，乌审陶利音柴达西北侧有甚小的察罕陶日旛，这就是察罕脑儿。还有人称，察罕八剌哈孙跟前曾有察罕脑儿，现已干涸。无论怎样，察罕脑儿这个名称是个总称，而且从当时是个行政机构名称。虽然不知其从哪个察罕脑儿命名，但是，在代表黄河河套地区忙哥刺所辖的那部分地区是毫无疑问的。在原鄂尔多斯地区比较大的察罕脑儿有几个：乌审和榆林间的察罕陶日旛音扎达盖(白海子)、乌审胡同察罕淖尔、乌审和伊金浩洛间的乌拉音察罕淖尔、乌审和伊金浩洛间的努很苏模音察罕淖尔(巴嘎淖尔)、伊金浩洛和神木间的特莫额恩哈达音察罕淖尔(称红碱淖尔)、乌审和鄂托克间的木都图察罕淖尔、鄂托克之氐图音察罕淖尔等。因这些察罕脑儿是否是综合名称，还是从某一个察罕脑儿的单独名称？至今未能找到文字记载，难以确认。如果假设从某个脑儿单独起名的话，就从今乌审旗黄陶劳盖乡境，南部与榆林打交界的察罕陶日旛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个白海子离元代察罕八剌哈孙旧墟最近，经测位，两地间的直线距离才 84 华里。而这里有非常适合牲畜饮用的淡水湖，这一带曾在历史上著名。起源于芒哈图呼日胡一直流至长城下的希伯儿河流域——水草丰沃的美丽的特莫额图希伯儿。所以，如果从某个脑儿命名为察罕脑儿的话，我认为就是从这个察罕陶日旛(白海子)命名的可能性最大。忙哥刺及其儿子阿难答五大都邑之一察罕脑儿官邸就在这一带。

这里必须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白城子(统万城)和察罕八剌哈孙(察罕脑儿城)是两个不同的城名。而且至今仍有该二城的废墟存在。白城子是南北朝时期的大夏国(413—428)的郝连勃勃所建的都邑，它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的白城子村境。它凸位在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北岸。而察罕八剌哈孙，是元朝忽必烈薛禅合罕时期的安西王忙哥刺或阿难答所建的夏宫。它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乡白城滩村境，史书记载称察罕八剌哈孙。经测位，两个旧墟间的直线距离为 90 华里，并且正好是东西向。白城子在横山县端西 90 华里。察罕八剌哈孙在横山县正北 60 华里处。真金太子从萨迦寺往回返的途中发病后，最适合疗理的地方当然就在这里，这是其重要条件之一。

(二)驿站枢纽——察罕脑儿

大蒙古国窝阔台合罕时期，设置了和林到中原地区的 37 个驿站。每 70 华里左右设置一站，由一名千户长负责管理驿站事宜。到元朝时期，驿站增加到 1500 多处。像星辰般地遍布、脉络般地连接，发展迅速。当时，从内地通往漠南漠北的驿站，根据当时的地形情况确定不同用途的驿道。其中有帖里干驿道、木邻驿道、纳林驿道等。那时候的驿道大致可分以下几大系统。从内地通往漠北地区有从大都至上都的东、中、西驿路；从大都、大宁至辽阳行省的驿路及以丰州、东胜为交通枢纽的驿路。下面我们探究真金太子送八思巴喇嘛到乌思藏地区的驿道的大略情况。“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榆林、西行至统幕分二路，[其中]一路西行至雷家站，九十宣德，一百二十夏永固，正南九十天成、六十白登，六十牛皮岭，正西五十大同。” [67] “常乐站(今内蒙古丰镇西南马家库伦乡三泉村附近)、下水站(今内蒙古凉城县岱海)、丰州总站(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68] 上述驿站是从大都到丰州的必经驿道。

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是元代漠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不但逆黄河到额里海牙(今银川)的 10 个水驿的起点，而且是渡黄河经河套到哈温等纳邻驿道 14 个站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这个纳邻驿道从东胜州渡黄河向西南可至察罕脑儿城(今陕西省榆阳区巴拉素乡)。到此以后，直往额里海牙的称之为北路，直到凤翔的称之为南路。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从东胜总站渡黄河到察罕脑儿总站驿站的详细记载。从察罕脑儿一路正南到凤翔的驿站如下：“察罕脑儿总站(今陕西省榆阳区巴拉素乡白城滩村)、白塔(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塔间)、寨门(今陕西省安塞县西北镰刀湾附近)、龙安(今陕西省安塞县龙安村)、延安(陕西省延安市)、六十五甘泉(今陕西省甘泉县)、九十五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六十五三川、七十五中邽、七十五宜君(今陕西省宜君县)、八十五同官(今陕西省同川市)、七十五耀州(今陕西省同川市黄宝镇)、九十龙桥。……一百凤翔。” [69] 从察罕脑儿到额里海牙的北路如下：“自榆林往宁夏正道，八十里至马齐图孔达海为一站，有小泊一方，八十里至海流

图为一站（在海流图河至今尚有称马路湾的地方——作者），有大河水。六十里至拖河图为一站，有小泊一方，井一口，六十里至纳林河为一站，有小河水，八十里至古垒一站，有井一口，八十里至阿儿滩噶达素为一站，有井一口，九十里至乌喇素一站，有井一口，七十里至察汉陀罗海一站，有井一口，五十里至哈沙图一站，有井一口，八十里至横城口一站，此路分为九宿。第十站至横城共七百三十华里。水甚少，路亦大沙。”[70]这是从察罕脑儿到额里海牙的旧驿道。经测量，榆林到察罕八刺哈孙旧墟有 80 华里。马齐图孔达海，在察罕八刺哈孙东侧不远处。并且，到较晚时期还使用着鄂前旗盐池到榆林的盐道，这有可能还是从察罕脑儿到额里海牙驿道的一部分。元朝时期，为何专修从察罕脑儿到京兆，从察罕脑儿到额里海牙的两条驿道呢？因为察罕脑儿不仅是元朝合罕拥有的 14 个私人牧场之一，也是军事要地，提举司仓库重地，重要军事牧场，驿站枢纽。而且为掌辩使臣奸伪“〔（后）至元〕（1335）……七月……立脱脱和孙于察罕脑儿之地。”[71]此大驿站是京兆、额里海牙、东胜三角地的关口。

从京兆向往乌思藏达萨迦寺的驿道轮廓如下：南路是从京兆到大都，从京兆到河西的专为处理军政要事而修筑的重要驿道。元代的驿站到定西州后，途经西宁向往萨迦寺。这个驿道首先从“奉元正西五十咸阳，五十兴平……一路正西九十武功，六十扶风，六十岐山、六十凤翔……从凤翔正北九十小川、七十蛮坊，董店、百一十泾州、西北八十白水、正西平凉、正西偏北九十瓦亭，四十五德顺州、百二十吴家湾、百二十会州、百三十定西州、西北百六十至此分二路、一路正西一百八十西宁。”[72]过西宁，向往乌思藏地区。沿途经拉萨达萨迦寺。这里所说的乌思是前藏，藏是后藏。当时再加阿里诸地就是整个吐蕃了。忽必烈合罕予其七子“于〔至元〕六年（1269）……冬十月……赐诸王奥鲁赤驼钮金镀银印。”[73]封西平王。吐蕃地区成为封地了。奥鲁赤死、子镇西武精王铁木儿不花、孙搆思斑相继承袭。吐蕃地区在元代一直是奥鲁赤家族的一系封地。元代初清查户口修驿道、择地设站。“吐蕃地区、朵思麻驿道有九站、朵思甘有七站、乌思驿道有四站、藏驿道有七站共有二十七站”[74]的记载。这是大站。大站间还有许多小站。驿站管理由元朝廷直接管理。不允许由当地的万户长管理。在元代到乌思藏的驿道经过西宁后，大概跟踪古代唐朝时期的松赞干布娶亲文成公主的旧道。

再说，当时吐蕃地区宗教行政中心萨迦寺的具体位置何在，理应推断其轮廓。据“1245 年八思巴(1235-1280)归服蒙古，带着他弟弟恰那多吉从吐蕃起程在途中经过拉萨孟和召当沙比受戒。”[75]的记载，可知萨迦在拉萨的西南方向。《元时期形势图》插图 32[76]所标明的元代吐蕃地区少数几处地名中记载为萨思迦。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标为萨迦。这符合“萨迦也称萨思迦、萨迦就是白沙的意思，是吐蕃语(藏语)。”[77]这两个名称都在一个位置上，位于今拉萨市的西南方向，在雅鲁赞布江流域。这些是真金太子到萨思迦给八思巴喇嘛布施，履行祭祀使命而往返途中经过的驿道轮廓。这一总道恰好与他哥忙哥刺王和侄子阿难答王在察罕脑儿，京兆，开成有行宫相吻合。现在已经说明了在这察罕脑儿之地有忙哥刺和阿难答的宫邸和东胜、京兆之间有必经之驿道的重要条件。所以，这就是真金太子从萨迦寺往回返的途中在这个察罕脑儿之地身患重病的由来。并且，在此原属唐无惕地区——今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治病无效故去。

四、京根神祇的祭祀及其祭祀者们

在上几段中概述了鄂尔多斯乌审直到现在还祭祀着的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介绍了近年来人们不留神接受了将京根称木合黎的错误论证，引用于著书并换牌立碑的情况。论证了京根是忽必烈合罕让其继位的真金太子，而且他是否继位。并找出将真金太子在蒙古语中产生“青格斡”和“京根”两种不同写法及读音之原因。此外，从“把阿秃儿”一词的历史使用范性中进一步申明了京根把阿秃儿，对真金太子去世于何时何地葬于何处的问题进行推论。往下对京根把阿秃儿敖包神祇祭祀及其祭祀者们进行考究。

（一）京根神祇（希都干）之祭祀

敖包、神祇、祭祀三个词，在蒙古语词汇当中有固定的定义被单独使用的语言单位，它都有各

自的固定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使用的范围及所表达的意思都不同。所以，笔者将借助本文对 13 世纪或比它更早的历史时期，蒙古人怎样堆筑敖包神灵举行祭祀及它的神祇图腾是什么，并且它们的祭祀过程如何，再说敖包神祇祭祀三者相互有什么联系等问题，结合当今的京根敖包神祇进行考究。

敖包是人们以祭祀为目的，用某一种材料从地面高处往上堆积而成的明显标记为敖包。堆积敖包用什么材料，在它周围有什么材料来确定。即近有树木用树木，近有柳草用柳草，近有泥土用泥土堆起。各个地方的敖包结构形状都不一样。敖包名称由其时的目的需要所确定。所以敖包的分类有多种。树建任何一个敖包其压桑礼仪是关键风俗。如果用什么材料竖起敖包是它的条件所确定的话，用什么来压敖包桑，更是其神祇所确定。所以把压敖包桑礼仪又称之为“造化神祇”(创大桑)礼仪。如今，已经判断出将位于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敖包称之为京根敖包代代相传至今，这个敖包的护神是忽必烈合罕三子真金太子，并且在时代方面是大元初期，13 世纪末。所以考究这个敖包神祇应该结合 13 世纪时期树建敖包的压桑礼仪。“蒙古人从信仰萨满教时期开始履行压敖包桑民俗。”[78]这样一来，在 13 世纪时期蒙古贵族世家成员故去后，为纪念或信奉，有时好像树建敖包压桑造化大神祇(创大桑)。因为蒙古人思想每个敖包都有护神，树建敖包前“挖坑为敖包护神建造地下宫殿，将敖包护神的四季服装、饮食及弓箭、鞍辔、锅碗瓢勺等放入在内，堆好沉香如生火似的，弄妥这一切后，请(巫师)喇嘛进里边，献神灯、念经文、创大桑开光后外出将专留的小门封好，对树建的敖包就开始进行祭祀礼仪。”[79]这是因当时的重要风俗礼节，京根敖包也应该照此礼节去建造。蒙古人树建敖包造化神祇的本身，就意味着由原始自然神祇向非自然神祇转移，由无标记性神祇向有标记性神祇发展。

神祇是基于原始自然神祇形成的，以灵魂祖上守护神为主，包罗其它诸项，从中信奉某种崇拜物称神祇。蒙古人的神祇以萨满教为主，蒙古帝国及元朝初期虽传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但萨满教在蒙古贵族阶层和平民百姓中一直没有失去主要神祇的地位。作为蒙古人原始宗教的末期形式，萨满教在原始自然神祇的基础上，普遍渗透于当时的敖包神祇祭祀过程中，在信奉和崇拜灵魂祖上守护神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萨满教思想精髓是视宇宙万物有灵魂，所以萨满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且不死，人有生存之灵魂、心境之灵魂、转生之灵魂有三灵魂。其中生存之灵魂终生伴随着人的生命，认为永远守护着人的敛气之地，才把这个灵魂当“护身符”信奉和祭祀，萨满教有信奉和崇拜祖上灵魂的风俗习惯。在伊和其其日嘎纳的京根神祇之原敖包是京根把阿秃儿敛气之地，便成为信奉和崇拜它的“守护神”灵魂之地。所以灵魂神祇永远守护着亡故者过世的地方。不仅在树建敖包时已经存在灵魂，而且这个有灵魂神祇的敖包任何时候都不得迁移或挪地祭祀。但是有因某种原因有中断祭祀的敖包。将此现象可以视为萨满教灵魂神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萨满教中不能迁移敖包，而在佛教中却可以迁移寺庙。在鄂尔多斯乌审因租地很多寺庙向北迁移祭祀。从中可知，萨满教与佛教二教能否迁移敖包和寺庙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特点和礼节。

祭祀是人们信奉和崇拜自然界某一种崇拜物或护身符叩拜祈祷的风俗。这里从祭祀一词的本身看，内容和形式多样，无不及之处，行之广泛领域的风俗。所以，那么多的祭祀中只看敖包祭祀。直到现在敖包祭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几乎没有失去其基本状况。蒙古人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形成压桑造化神祇树建敖包变祭祀台履行其祭祀风俗。在《史记·匈奴列传》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在《后汉书卷九十八·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称：“匈奴俗、岁有三岁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走马及骆驼为乐。”在《北史卷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河段就元眷 高车》称：“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唐代颜师古称：“蹕者，绕林木而祭天。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季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这里称祭祀时间为正月、五月、九月，祭祀内容为宰畜杀牲游绕敖包三圈及赛马赛驼、欢歌作舞等风俗与当代敖包祭祀大致相似。在诸多祭祀中，敖包祭祀举行得最为隆重，集会人众多等与现在基本相似。从信奉和崇拜祖上天地神祇礼仪中，古代萨满教祭祀风俗原状，仍很明显。看得出，在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京根敖包祭祀风俗基本保持古代相传的祭祀原状。在以上简述了什么是敖包、其重要风俗是什么、什么是神祇

（希都干），蒙古人如何信奉灵魂祖上守护神以及什么是祭祀及如何进行祭祀礼仪等。下面阐述隶属于蒙古族敖包文化范畴的敖包神祇祭祀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京根敖包神祇做出准确的推理。

敖包神祇祭祀三者是互不分离紧密联系的有机结合体。这里敖包是形式、神祇是内容、祭祀是目的。这三者虽然有着各自独立的民俗概念，但在现实环境中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可以说没有神祇的敖包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一样。神祇的表现形式就是敖包，敖包的存在意义在于神祇。人们通过敖包达到对祖先之“守护神”——灵魂神祇进行祭祀的目的。萨满教重要民俗的压敖包桑过程，不仅是树建敖包造化神祇的过程。而且还是树建敖包的重要前提条件。已经竖起敖包就成为祭祀神祇的场所。祭祀敖包的本身，实际上就是祭祀神祇的过程。所以，树建京根敖包的时候，一定是严格依据当时萨满教压桑民俗去造化神祇的。履行京根敖包祭祀礼仪，比乌审其它诸敖包祭祀更规范。从其祭祀者们的那种年年不隔、世世不绝的举动，足以表明这个京根敖包神祇与其它普通敖包截然不同。

真金太子斂气故去后，安葬于何处，史书中至今尚未找出线索，现在只能结合 13 世纪蒙古族丧葬文化秘葬礼仪和敖包文化压桑礼节来对这个京根敖包究竟压桑了，还是成殓造墓了，做进一步的探索。其实京根敖包压桑时究竟压了什么？如今谁都难以说明。只能用当时的压桑礼仪来说明它。在京根敖包下压某一物为桑，还是成殓造墓了，作以判断是至关重要的。有人称“为了隐瞒……真名墓地。”^[80]就在京根把阿秃儿敖包下，将木合黎尸体成殓造墓了。在蒙古族丧葬文化中有“秘葬”礼仪，敖包文化中有压桑礼仪。所以，在敖包文化中几乎不存在“成殓造墓”的可能。因为蒙古族敖包文化和丧葬文化都所属于各自独立的民俗范畴。在现实的丧葬礼仪中萨满教与佛教文化不仅混杂进行，而且在丧葬文化和敖包文化中交叉进行。这主要表现在祭祀神祇的角度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它的内容和形式的角度还是相互排斥的。敖包文化体现于灵魂神祇，而丧葬文化体现于墓莹墓葬，相互有区别。在标记学角度坟墓以标记形式体现，敖包也以标记形式体现，它的标记形式是相同的。但是每个墓地都指出一个具体丧葬之处的标记符。而每个敖包都指出天地灵魂神祇的标记符。所以敖包和坟墓在逻辑学角度是谁都不相容的并列关系的概念。而认为坟墓从属于敖包或敖包所属于坟墓的支配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有可能成为混淆逻辑概念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敖包所建是为了祭祀天地灵魂神祇的，而坟墓所建是为了丧葬死者尸体的。所以将敖包压桑礼仪视为成殓造墓倒不如直接称之为墓地或陵地更为恰当。京根神祇是京根敖包，而不是京根陵地也。在蒙古族丧葬文化中有“秘葬”礼仪。“这个秘葬礼仪将亡故者尸体埋入地表层深处。再把动过的地表层部位蹴平致使别人认不出来……后人无法看出在这块有墓地。……这个秘葬礼仪大概在中世纪的动荡时期在尼鲁温蒙古人中形成并传承。其目的是，严格防御别人创墓而作。”^[81]但是秘葬主要采用于部族首领或宗主或合罕诺颜惕的丧葬中。平民百姓没有必要秘葬。所以，真金太子遗体必须采用秘葬。这是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所确定。这是将真金太子如何安葬的可能性作的判断。但是，对真金太子安葬于何处的可能性进行推断的话，也是有两种可能性并存的。一种可能是在真金太子斂气地点就近任选一处地块进行秘葬；另一种可能是与他先祖们一样送到大都或上都和太子后，太子妃斡儿朵各过宿，并履行真金太子过世后应完成的丧葬习俗后，驮到在蒙古故乡不儿罕哈里敦山一带蒙古合罕诺颜惕公墓举行秘葬。我认为由以上两种可能性中，后一种可能性最大，这是我对京根把阿秃儿的遗体安葬于何处的判断。

从京根神祇现状看，以祭祀纛之神祇为主。这也许将纛之神祇北移的原因。但应该详细考究京根神祇的纛之神祇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被祭祀。压桑树建敖包时虽能压桑亡故者的弓箭等兵器，鞍辔等用品，但不可能将威严的纛座落于固定的地方去崇拜或信奉。因为京根把阿秃儿在 13 世纪末元代初去世，蒙古人当时虽然是在将军纛出征前举行祭祀，但是将军纛放一处固定的地点纪念或崇拜的思想也许尚未形成。而北元结下尾幕，蒙古人被清朝控制，弓箭被火枪代替，蒙古骑士手中的兵器，普遍被插入家家户户的柳笆桩上并变为神祇或崇拜物，在佛教的渗透下变为三叉戟形状，安插在焚香台杆端被祭祀的时候，京根神祇将复制黑纛安插在长木杆端上，插座于敖包顶端作为崇拜物，后变为三叉戟形状被祭祀的可能性较大。无论如何京根神祇纛之神祇与灵魂神祇也许不会是同一个时期形成并被祭祀。所以这方面有必要详细考究。有些研究文献中称：“用于国家仪式军队仪仗的旗

子，藏语称：头格，蒙语称：图格，畏兀儿语称图格，汉语称纛化为几个民族共有的词了。”[82]这里称它的应用范围为国家仪式军队仪仗。成吉思合罕树起的，成为蒙古帝国威严和象征的白纛，无疑是国家仪式的唯一纛也。那么“九大象征之首是威严莫大的哈日图格(黑纛)恫吓他人的象征也。”[83]这就是国家最坚硬的工具军队的象征。此規制由忽必烈合罕确定。所以表明在蒙古罕国只有国家的白纛和军队的黑纛两个纛的道理。那么后来怎么又变成这么多的纛之神祇呢？这个问题应从北元末期发生的事情中看。即林丹合罕来到鄂尔多斯不久，北元崩溃之前夕“蒙古各式各样的神祇再次集中于鄂尔多斯地区。”[84]不久林丹合罕北元灭亡，清王朝分封将蒙古人分为多部来进行控制。康熙(1662)时期，诸盟组成五百户达尔哈特人主持祭祀礼仪的时候，除国家白纛随林丹合罕由留守在乌审的察哈尔人在原地祭祀外，黑纛、花纛(成吉思诸弟的)与其他诸神祇一起，集中祭祀在伊金霍洛。但是在雍正(1723)时期，通过封旗尝到了分封制甜头的清朝统治者严防鄂尔多斯人利用祭祀机会起义，将集中了的诸神祇分到各旗祭祀时，除乌审旗在原有白纛祭祀外，还要完成黑纛、花纛祭祀礼仪。没多久，到乾隆(1736)时期，清政府分割政策到了极点，更加细化，乌审旗十个哈然，每个哈然都复制黑纛花纛树敖包建寺庙，令其所属，各祭其祀。“乌审哈然察罕苏勒德……还有从察哈尔的察罕苏勒德薰香复制两个…察哈尔哈然察罕苏勒德……畏兀儿津哈然称京根神祇的哈日苏勒德，哈尔哈坦哈然哈日苏勒德……边速惕哈然阿拉格苏勒德(花纛)……大客烈亦惕哈然哈日苏勒德……小客烈亦惕哈然哈日苏勒德……朵脱刺音哈然哈日苏勒德……秃思朵脱刺音哈然阿拉格苏勒德……孔迪哈然哈日苏勒德等各祭其祀。”[85]又“乌审旗十个哈然中客烈亦惕黑纛，乌审白纛，察哈尔花纛，畏兀儿津京根神祇，哈塔斤家神祭祀。”[86]的记载，从上述依据证明了京根神祇之灵魂神祇比纛之神祇形成的更早，从该神祇的角度将灵魂神祇考为最初的神祇，纛之神祇为后来之事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而言之，灵魂神祇是古代萨满教思想的精髓，它在蒙古政权的形成以前已经形成，而且被崇拜。但是纛或者纛之神祇在蒙古政权形成时形成并有了地位，随着蒙古政权的崩溃而变为神祇被祭祀。

京根敖包神祇的祭祀时间及其程序如下：1.腊月二十九日之祭祀礼仪。每年腊月二十九日，该神祇主珠玛或轮值珠玛献焚香，诵《伊金桑》、《苏勒德之桑》，吹响海螺，将纛之神祇从毡包斡儿朵中请出外面，安插在金龟脊背之上。献只牲羊祭祀。这称被拜年之礼节。直到翌年正月初三止、献通宵明灯。2.正月初三之祭祀礼仪。将纛之神祇保持二十九日插之原样。从正月初一开始，来自远近的祭拜者们前来京根神祇祭祀处。除了叩首拜年外，还献送粉绢哈达，神灯之油、牲羊、砖茶、金钱等。同时祭天神显热拉天神威风（用沙蒿、芦草、捆成11—13个耙子，用火枪射击或用刀砍之——作者）诵平安富足的祭词祈祷文。完成祭祀礼仪后，珠玛们将纛之神祇再请回毡包斡儿朵，此次祭祀就结束了。以上两次祭祀均在格德希音塔拉之毡包斡儿朵举行。3.五月十三盛大的祭祀礼仪。在鄂尔多斯历法八月十三日珠玛及施主们提前两天从格德希音塔拉起程，途中住两宿到达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京根敖包原处去。从按顺时针方向绕一周后，将纛之神祇安插在京根敖包顶部，就上敖包祭祀台献香火桑德吉，对京根把阿秃儿灵魂“守护神”履行祭祀的同时，对京根神祇之纛之神祇履行祭祀。诵《伊金桑》《苏勒德之桑》，献祭词祈祷，完成盛大的祭祀民俗。举行完男子三技比赛，当晚就请纛之神祇上返程。由于将纛之神祇北移的原故，为了完成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之十三日的盛大祭祀，还增设了十一、十五两次祭祀。这两次祭祀均在格德希音塔拉上侧的毡包斡儿朵举行。4.五月十一日晨，将京根神祇之纛之神祇从毡包斡儿朵中请出外面，安插在金龟脊背之上，献上德吉神灯和牲羊、诵《伊金桑》、《苏勒德之桑》，吟诵祭词祈祷之文，祭天神显热拉天神威风。举行完男子三技比赛之后，当晚将纛之神祇，请上公马出发，南下伊和其其日嘎纳。途中住两宿于五月十三日早晨日出时，到达京根敖包祭祀地点。举行十三日盛大的祭祀礼仪。5.五月十五日，举行完十三日在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盛大祭祀后，将纛之神祇，再请上公马上返程。路上又住两宿，五月十五日晨到达格德希音塔拉后，将纛之神祇从马背请下白毛毡垫，安插在金龟脊背之上就焚香、献桑，吹海螺，诵《伊金桑》、《苏勒德之桑》，行裸祭礼，用只牲羊祭祀后、请回毡包斡儿朵安插在白石狮脊背之上、祭祀结束。为了十三日祭祀事宜，往返途中住四宿。而每宿都有将纛之神祇安插在白毛毡垫之上，用只牲羊祭祀的民俗。6.最后记个特殊的祭祀时间。由查干宝恩敦，察·哈斯毕力格图等将京根神祇称之为木合黎神祇之后，该神祇之珠玛们为了纪念丁丑年秋成吉思合罕给木合

黎封太师、国王，赐旗之事，自将纛之神祇从成吉思合罕陵请回来的 1986 年起，把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四日，即鄂尔多斯历法特日贡呼格鲁儿之十四日，选定为祭祀之日，履行祭祀。这一日，成吉思合罕陵苏勒德祭祀者们——达尔哈特人也来到这里，用只牲羊祭祀。^[87]在此特别列举的是因清朝末年租放土地的原故，随着蒙古人的北移，将京根神祇的纛之神祇从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迁移到当今的格德希音塔拉，安插在毡包斡儿朵祭祀后，每年的五月十三日这一天，才有一次敖包和纛被一齐祭祀，其他五次只有纛之神祇被祭祀，灵魂神祇不被祭祀了。这个情况可以视为该神祇在特殊历史背景所产生的特殊现象。由此引起在京根神祇的祭祀中出现了纛之神祇的祭祀被重视，灵魂神祇的祭祀被忽视的现象。因为将纛之神祇每年祭祀六次时，灵魂神祇每年只有祭祀一次，还没有一只牲羊的祭祀了。

除此之外，在伊和其其日嘎纳西梁的京根敖包现状看，因当地人紧靠主敖包的阳面建了寺庙，敖包正面完全被遮掩。从寺庙的外部形状看，庙顶上插着像蒙古人的寺庙似的三叉戟，但往里一进，正北墙壁上画满了关云长之站立图像，东西墙壁上也画满了他的事迹图像。后来按该神祇之珠玛和施主们的要求，在北墙壁中下部，朝敖包方向往里掏出正方形窟窿，其中上挂成吉思合罕画像，里面还摆设着刀，剑等文物。这样，此处既成为蒙古人祭祀敖包神祇的场所，又成为汉人信奉和祭祀关云长（关公）的场所了。这样因蒙古人北移留下的萨满教灵魂神祇之祭祀标志，引入汉族民间道教的祭祀内容，使原神祇产生了异化。此外，因在敖包梁的四周挖沙取土或平整地面建房，这神圣之地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二）京根神祇之祭祀者们

蒙古政权地方机构在大蒙古国时期，通过右中左三万户、九十五个千户及其下有百户十户，元朝时期通过十个行省及其下路县等，北元时期通过六万户及其下称鄂托克的部族诸大集团等统制，皇室世系的宗主们封地和分人户管理的世袭系统从未断线过。在满清时期通过二十四盟及其下旗哈然佐等统制，这盟旗权力均由黄金家族王公世袭。蒙古社会制度基本没有产生过变化。下面笔者就蒙古政权的各个时期以及满清期间的畏兀儿津（维吾尔或畏亦忽惕）部族的轮廓及其在接受承担祭祀京根敖包神祇使命之状况进行概括性的阐述。

畏兀儿部落是有自己君长的突厥诸部落之一。“的卜一牙忽亦是……阿不勒扎汗的儿子，[由的卜——牙忽亦四子]”合刺汗、斡儿汗、古儿汗、阔思汗[中]由于哈刺汗之子乌古思皈依了一神教。”^[88]崇拜唯一的上帝或主，乌古思和他的父亲，叔父们之间产生仇恨，互相打起仗了，当时乌古思的有些亲族与他联合，站在他这边。对那些归附于他并成为他的协助者的人，乌古思赐以畏兀儿之名。这是一个突厥词波斯语，含义为“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其意为“依附、归附、参加”。这帮人经常同乌古思在一起。乌古思想要征略其它国家时，就把畏兀儿人从山谷地区叫回来，让他们驻守在自己国内，直到他班师为止。畏兀儿各部落全都出自这帮人。后来，从乌古思六个儿子及归附于他的若干兄弟、堂兄弟中分出二十四部落。“[这个]康里，钦察、哈刺鲁、哈刺赤、阿哈赤——额里等部落按特殊原因以各自的名称著名以后畏兀儿一词就专用于剩下的诸部了”。^[89]乌古思的叔父及归附于他们的迁居到东方的所有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都出自他们的氏族。而这些畏兀儿部落因驻在蒙古地区西部边境一带。过了若干岁月和世代，还没有指定的君长，经部众议决，“额必失里克部落选出一个名为忙古台的人，授以亦勒迪必儿之号，[他们]还从兀思浑都儿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勒；他们让这两个人作了[全]民族和诸部落的君主。他们的氏族[兀鲁黑]统治了百年之久。”^[90]

成吉思合罕之前，畏兀儿人称自己的君主为亦都护。在成吉思合罕时代称巴刺术黑的人为亦都护。当古儿汗成为河中和突厥斯坦各国的占胜者时，亦都护前去向他表示完全屈服。古儿汗向他派去了一个长官名少监。当其逐渐掌握了大权后，他便向亦都护及他的异密们和畏兀儿诸部施展出强暴手段，索取额外的税赋。他们都对他感到厌恶。正当此时传来消息说，成吉思合罕已征服了乞台地区，听到了他的威武强大的传闻。将这个少监处死于哈刺——火者的村庄里，为表明对合刺契丹的敌对态度和对成吉思合罕驯顺，亦都护向成吉思合罕派去了名为合勒迷失一合塔。乌马儿——斡

忽勒和塔塔儿的牧人使团，成吉思合罕抚慰了来使，并降旨让亦都护前来陛见。他服从了圣旨，荣膺了成吉思合罕的特使之垂青和恩赐而归。当成吉思合罕战无不胜的军队征讨古失鲁克汗时，亦都护遵旨带着三百人出征。立下了英勇功勋。后来，他获得许可后，带着他的近侍和部队返回。当成吉思合罕进军大食地区时，亦都护奉旨带着他的军队出征。他充任宗王察合台和窝阔台的侍从，在攻占讹答刺城时，曾显示过奋勇。在此之后，他同异密塔儿拜和也速儿以及一个军畜草料供应人，一同前往成吉思合罕处。由于这些丰功伟绩，他博得成吉思合罕对他的特殊恩宠，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亦都护，但由于成吉思合罕逝世而未能举行婚礼，而回到了别失八里。“窝阔台合罕即位后，履行了父亲许下的婚约，将阿勒屯别吉赐给了亦都护。但在他来到窝阔台合罕大营之前，阿勒屯别吉已经死了。过了一些时候，合罕又将阿刺只别吉许配给他，但在她被交给他之前，亦都护死去了。他的儿子乞失马因前往臣事合罕，当了亦都护，并取了阿刺只别吉，但不久他也死了。他的兄弟撒邻迪，按照脱列哥那哈敦之命，继承兄位，作了亦都护。”[91]“成吉思合罕以后，畏兀儿部族亦都护汗由巴刺术黑子孙世代代服侍于大蒙古国和元朝朝廷，宠作国婿。”[92]“至元十七年二月……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三月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93]从上述依据得知，畏兀儿诸部在乌古思汗时期形成到成吉思合罕时期或其后在窝阔台合罕时期及元朝时期的地位。

在北元时期，鄂尔多斯万户右翼由亦不刺之女阿穆尔津所生的阿穆尔达喇管辖，并形成有四鄂托克卫部尔沁的部族大集团。这个集团加入鄂尔多斯万户，虽归属右翼，但与其他集团有别，不在十二鄂托克之列，是一件特殊事情。“这个情况与衮必里克的第八子，第九子的母亲的出身有关。衮必里克……[第]四位夫人，亦不刺太师女儿阿穆儿津哈屯……是阿穆尔达喇，鄂克拉罕之母亲。”[94]亦不刺在十六世纪初（1501）来到了河套，继同族亦思马因成为应绍卜首领。统治应绍卜和阿儿秃斯两部。

此后（1511），由于达延合罕立其二子兀鲁思·孛罗阿巴海为右翼三万户的吉囊。亦不刺、满都来二人不从，居心勾结，谋害无辜的兀鲁思·孛罗。随后达延合罕率领左翼三万户和叔王火儿慎部出征征讨右翼。亦不刺，满都来战败西逃到青海一带。达延合罕立巴儿速孛罗·赛那刺坐镇右翼三万户。《明实录》和《边政考》记载嘉靖九年（1530），阿儿秃斯入青海与亦不刺结亲。达延合罕的儿子巴尔斯博罗特的儿子衮必里克取了亦不刺之女。这个女人就是阿穆尔津哈屯，衮必里克八子阿穆尔达喇和九子斡克拉罕是她所生的。可是到嘉靖十年（1531）巴尔斯博罗特死后两年（约1533）衮必里克到青海袭破亦不刺和卜儿孩，收其部落大半。关于亦不刺的出生《蒙古源流》说是永谢布，《黄金史》说是卫郭特，和田清认为是哈密北方的野也克力（拉史特称别克邻）部。“亦不刺……与别格儿先、亦思马因是同族。……他本人出身于野也克力，续同族亦思马因成为应绍卜首领。蒙古人以为野也克力是畏兀儿人，所以又称他们为畏兀儿人。”[95]亦不刺带领包括畏兀儿在内的部民来到河套居住，则是事实。因此有的编年史说他出身于卫郭特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前面提到的阿穆尔达喇母亲的出身，衮必里克不断向西伸展的活动和亦不刺的出身及其活动，应该是卫郭尔沁本为亦不刺直接领有，由于他与衮必里克的种种关系，大概后来归于衮必里克领有了。这是关于畏兀儿津部族来到鄂尔多斯活动的大略情况。北元时期的太师是与合罕攬权夺位的非孛儿只斤氏的贵族阶层首领。在东蒙古太师很少，在达延合罕以后，太师被黄金家族势力推翻，但在西蒙古四卫拉特的脱欢太师，也先太师等是夺取过罕位的人物。

下面从鄂尔多斯十二鄂托克及达延合罕之孙衮必里克墨尔根吉农分封九子的情况看畏兀儿津部族。

（一）十二鄂托克：“右翼：伯特金（哈塔斤），哈里郭沁一鄂托克；巴苏特，卫新一鄂托克；墨尔格特，叭哈纳思一鄂托克；达喇特、杭锦一鄂托克；乌喇特、唐古特一鄂托克；克古特，锡包沁一鄂托克。左翼：豁牙古沁（豁牙尔古列延）一鄂托克；火你沁一鄂托克，明阿特（明安）一鄂托克；察哈特一鄂托克；克里野斯（吉尔吉思）一鄂托克；浩齐特（浩古齐特）一鄂托克。”[99]这里提到诺延达喇的四豁里牙，阿穆尔达喇的四鄂托克卫郭乐沁和斡克拉罕的三鄂托克阿玛该：此外，还有哈尔噶坦等大集团未入十二鄂托克之列。

(二)分封情况：“1.诺延达喇济农：四豁里牙（四营）；右翼：2.拜桑固尔：克古特（扣克特），锡包沁、乌喇特，唐古特（图伯特）；3.卫达尔玛：达喇特、杭锦、墨格特（墨尔格特）叭哈纳思；4.诺木塔尔尼：巴苏特，卫新；5.布扬古赉：伯特金，哈里郭沁；6.阿穆尔达喇：四鄂托克卫郭尔沁；7.鄂克拉罕：三鄂托克阿玛该。左翼：8.班扎喇卫征：浩沁（浩齐特）、克里野斯；9.巴特玛散巴斡：察哈特，明阿特，火你沁（科你沁）豁牙古沁（三十四处）（100）（注：有括号（）的均为按清译《源流》作一作者）。上述关于鄂托克之列或九子分封中出现的卫郭尔沁部族，比利时蒙古学者田清波在《鄂尔多斯志·鄂尔多斯部名考》第25、26条称：“畏兀尔沁、畏亦忽惕。比较[像是]维吾尔人的名称一样。《蒙古秘史·第五卷》称畏亦忽惕是复数形式。当前我们从萨冈彻辰书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部族名称而且也是乌审旗一个哈然名称的记载。把畏兀儿津一词写为畏亦忽惕是《阿勒坦·托卜赤》有卫拉特的畏亦忽惕人的记载而来的。”

综上所述，在北元时期，卫郭尔津部族从别格儿先、亦思马因等统辖鄂尔多斯部时留居河套。但其被收为帝室世系的部民，还是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衮必里克到青海袭破亦不剌和卜儿孩以后的事情。就此我们应该推断出两件事来。其一，畏兀儿津部民开始祭祀京根敖包的时间，最早也不过是别格儿先太师占居河套的明成化四年（1468）以后的事情。要么就所属于衮必里克部民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以后事了。其二，真金太子是元朝世祖嫡子。畏兀儿津部族是乌古思后裔，是非黄金家族范畴。所以畏兀儿津人祭祀京根敖包不是祭其祖上的神祇，而是像祭祀成吉思汗灵魂神祇的达尔哈特人一样担负着祭祀京根神祇的神圣职责的人。此外，清朝时期或至今一直由畏兀儿津部族履行祭祀京根敖包职责的事，在乌审人人皆知的事实。

那么，真金太子斂气故去时间是十三世纪末，这已辩明。可是畏兀儿津部族留居鄂尔多斯最早也不过十五世纪中叶后，这也已辩明。可在这一期间究竟由谁来完成这个祭祀事宜，至今也未能找到文字依据。但应该推断其轮廓才对。从元代忙哥剌开始，在察罕脑儿一带由其属部的四千户游牧于鄂尔多斯地区。其后，在整个元代由皇家出身的封建领主有权的人在这察罕脑儿之地交相更替从未终止过。“于至大三年（1310）……九月……立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察罕脑儿之地。”[97]“至正十九年（1359年）……七月……庚子，诏以察汗脑儿宣慰司之地属资政院，有司毋得差占。察汗脑儿之地，在世祖隶忙哥歹太子四千户，今从皇后奇氏请，故以属之资政院。”[98]“[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立行枢密院于「阿难答察罕脑儿」，命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仍前少保兼知行枢密院事。”[99]此时，距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前只有一年。察罕脑儿之地是蒙古军队屯驻的主要基地，是军事行政重镇，蒙古宗王属部一直游牧于此地。据明人记载，北元初期在察罕脑儿之地，明人称：“天下奇男”的扩廓帖睦儿所控制。于明洪武年间退出河套，进驻漠北。明天顺六年（1462）毛里海王、斡罗出少帅，伯彦猛克孛罗忽吉囊三人领其部民第一次来到河套地区。成化四年（1468）别格儿先太师杀死了斡罗出少帅，收其部众。勾结与元室世系满都鲁占居河套。成化末年（1479）亦思马因太师杀了别格儿先，继其应绍卜部的首领。其后由亦不剌太师继之。这就是蒙古人在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居住或游牧的大略情况。真金太子是元代帝室世系祖上之一。所以蒙古人只有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或游牧，就有可能不间断地对京根敖包履行祭祀。可是后来，蒙古人定居鄂尔多斯，并局势稳定后才交给了畏兀儿津部族祭祀而已。

参考文献

- [1] 包·达瓦扎木苏，扎·格日勒朝格图. 木华黎神矛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11—12.
- [2] 包·达瓦扎木苏，扎·格日勒朝格图. 木华黎神矛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16.
- [3] 塞音吉日嘎啦. 蒙古族祭祀[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105—106.
- [4] 塞音吉日嘎啦. 蒙古族祭祀[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109—110.

- [5] 乌审旗政协. 乌审文史[M]. 蒙文版(第十六期), 1992. 15—16.
- [6] 乌审旗政协. 乌审文史[M]. 蒙文版(第十六期), 1992. 39—42.
- [7] 阿尔达扎布译注.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402.
- [8] 阿尔达扎布译注.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396.
- [9] (波斯)拉施特主编, 余大均, 周建奇译. 史集[M]. 汉文版, 第一卷第二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46.
- [10]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32.
- [11] 阿尔达扎布译注.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386.
- [12] (波斯)拉施特主编, 余大均, 周建奇译. 史集[M]. 汉文版, 第一卷第二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46.
- [13] 王维国校注, 呼和温都尔校译. 圣武亲征录[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1. 30.
- [14] 乌兰. 《蒙古源流》研究[M]. 汉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150.
- [15]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3.
- [16] (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编. 剑桥中国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01.
- [17] E·D·弗里夫斯著, 冈田英弘日译, 官布仁钦译. 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3. 81.
- [18]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36.
- [19] (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编. 剑桥中国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96.
- [20] 罗密著, 纳古单夫, 阿尔达扎布校注. 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民族出版社, 1989. 168.
- [21] 罗密著, 纳古单夫, 阿尔达扎布校注. 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民族出版社, 1989. 174.
- [22] (清)纳塔著, 乔吉校注. 金鬘[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31.
- [23] 马可·波罗著, 赛熙亚乐译. 马可·波罗游记[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292.
- [24] 乌兰. 《蒙古源流》研究[M]. 蒙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354.
- [25] (清)答里麻著, 乔吉校注. 金轮千辐[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102.
- [26] 乔吉校注. 恒河之流[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67.
- [27] (日)爱岩松男著, 宝彦德力格尔译. 忽必烈汗[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3. 80.
- [28] 巴·巴根校注. 阿萨拉克齐史[M]. 蒙文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70.
- [29]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518.
- [30] 巴音仓编著. 蒙古佛教[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434—435.
- [31] 尼·鲍培原著, 郝苏民翻译补注.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M]. 汉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6. 99.
- [32]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888.
- [33] 马可·波罗著, 赛熙亚乐译. 马可·波罗游记[M]. 蒙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297—298.

- [34]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8-2889.
- [35]洪用斌,张泽凡编著,森布尔译.忽必烈与元朝[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56.
- [36]罗密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89.175.
- [37]乌审旗政协.乌审文史[M].蒙文版,第十六期,1992.62.
- [38]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汉文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234.
- [39]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52.
- [40]
- [41]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汉文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235.
- [42]罗密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89.49.
- [43]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43.
- [44]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70-71.
- [45]乔吉校注.恒河之流[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40.
- [46]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84.
- [47]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99.
- [48]乔吉校注.恒河之流[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48.48.
- [49]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79.
- [50]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版,第一卷第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0.
- [51]罗桑丹津.黄金史[M].手写体蒙文版,国家印书馆,乌兰巴托,2000.9.
- [5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汉文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361.
- [5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汉文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369.
- [54]罗密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89.176.
- [55]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
- [56]金巴道尔吉著,留金锁校著.水晶鉴[M].蒙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440.
- [57]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汉文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234-235.
- [58] (蒙古)德·高恩高尔撰,包金钢,呼日勒巴特尔转写.喀尔喀简史[M].上册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221.
- [59]罗密著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89.172.
- [60] (日)爱宕松男著,宝彦德力格尔译.忽必烈汗[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164.
- [61]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0.
- [62]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78.
- [63]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224.

- [64]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79.
- [65] 周清澍.元蒙史札[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286—287.
- [66] 周清澍.元蒙史札[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272.
- [67]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24.
- [68] 蒙古民族通史[M].第二卷,汉文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83.
- [69] 蒙古民族通史[M].第二卷,汉文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28.
- [70]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M].汉文版,南天书局中华民国十七年.120.
- [71]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827.
- [72] 蒙古民族通史[M].第二卷,汉文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27-128.
- [73]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
- [74] 蒙古民族通史[M].上册,蒙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582.
- [75] 巴·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M].蒙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432.
- [76]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M].汉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08.
- [77] 巴·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M].蒙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46.
- [78] 布林特古斯主编.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M].蒙文版,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86.
- [79] 布林特古斯主编.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M].蒙文版,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87.
- [80] 乌审旗政协.乌审文史[M].蒙版(第十六期),1992.39.
- [81] 葛·纳·胡尔查毕力格.蒙古族丧葬文化[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205.
- [82] 仁钦嘎瓦.名称词化为公有的因由[J].内蒙古语文历史,1959,(3).28.
- [83] 留金锁整理注释.十善福白史册[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85.
- [84] 额尔克斯庆编著.察干寿力德和他跟随者[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33.
- [85] 额尔克斯庆编著.察干寿力德和他跟随者[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35-36.
- [86] 查干东编著.乌审史志[M].蒙文版,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蒙语办,2002.25.
- [87] 包·达瓦扎木苏,扎·格日勒朝格图.木华黎神矛祭[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4—55.
- [88]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一卷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25.
- [89]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一卷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6-138.
- [90]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一卷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1.
- [91]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M].汉文版,第一卷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4.
- [92] 赛熙亚乐.成吉思汗史记[M].蒙文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640.
- [93] (明)宋濂等撰.元史[M].汉文版,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223.
- [94] (日)森川哲雄.鄂尔多斯十二鄂托克考[J].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3).11.

- [95]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 汉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377-378.
- [96]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 汉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9.
- [97]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 汉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7.
- [98] (明)宋濂等撰.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26.
- [99] (明)宋濂等撰.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80.

Research on the Jinggen-Baatur Aobao Shrine

Tumenjirgal

(Office of national land and resources in Wushen Banner in Erdos, Inner Mongolia, Dongsheng, 017300)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origin of the Jinggen-Baatur.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Jinggen-Baatur is not the Mohlai, and considers that Jenggen-Baatur Aobao is the tomb of Zhenjin Taizi who is the khublai Kan' son. He also researches the ritual and those who are worshipping.

Key words: Jinggen-Baatur;Aobao; Aobao shrine; Mohlai; Zhenjin Taizi

收稿日期: 2011-09-13;

作者简介: 图门吉日嘎拉(1955-),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国土资源局干部,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